

監控社會中的消息來源保護：
《史諾登揭密後的新聞業》

陳雅琪*

書名：*Journalism after Snowden: The Future of the Free Press in the Surveillance State*

編者：Emily Bell and Taylor Owen, with Smitha Khorana and Jennifer R. Henrichsen

出版日期：2017

出版社：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廿一世紀，當真是新聞業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一方面在網路及社群媒體的夾擊下，傳統媒體的閱報率、收視率早已江河日下，生存在懸崖邊緣；另外一方面也拜科技之賜，許多機構內的知情人士勇於扮演「吹哨者」（whistleblower），將大量的資料公諸於世，讓國家

投稿日期：106年12月4日；通過日期：107年1月14日。

* 陳雅琪為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e-mail: cyq14@ulive.pcc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陳雅琪（2018）。〈監控社會中的消息來源保護：《史諾登揭密後的新聞業》〉，
《新聞學研究》，135: 193-202。

DOI: 10.30386/MCR.201804_(135).0005

的不人道攻擊手段、政客或是企業家的逃稅洗錢這些亟欲被保密之事都被迫見了光。若干年後回顧，「揭密」也許會是過去十年來最顯著的關鍵字：從 2006 年維基解密（WikiLeaks）上線運作、2010 年披露由美國士兵曼寧（Bradley Manning，後於入獄服刑期間接受荷爾蒙治療，變性為女性，改名 Chelsea Manning）所提供的美國軍方機密報告、2013 年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政府大規模的非法監控稜鏡計畫（PRISM）、再到 2016 年的「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曝光史上最大避稅及洗錢醜聞、然後是 2017 年的「續集」－「天堂文件」（Paradise Papers），對全球政商名流的避稅行為解密。在重要的新聞事件中，「吹哨者」的存在不是秘密，但曾服務於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的史諾登，不再只是躲在暗處，他選擇帶著文件資料前往香港，主動與新聞記者接觸，公開美國政府大規模的監控計畫。史諾登的行動，昭示新聞業應該從網路技術源頭重新思考資料和消息來源保密的概念，挑戰新聞記者對於數位資料安全的想像和處理能力。

史諾登揭密為美國的新聞業投下了震撼彈，不僅是他所提供的內容確切地指出美國政府在未經人民知情同意下對人民及外國領導人進行竊聽，還包括美國政府宣稱這些資料涉及間諜法，以公開資料可能會對美國在其他地方佈署的軍事力量造成傷害要求紐約時報等媒體三思；英國政府甚至派出情報機關官員要脅衛報（the Guardian）總編輯必須親手砸毀存放資料的電腦。史諾登更在離開香港、搭上前往莫斯科的班機之際，被美國政府註銷其護照效力，在莫斯科機場裡成了人球。這一連串足以比擬電影情節的事件接連展開，怎能不教新聞工作者重新思考民主、新聞自由的內涵究竟為何。由於牽連層面甚廣，2014 年由長期關注新聞發展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陶氏數位新聞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就發起《史諾登事件後的新聞業》(Journalism After Snowden) 的整合型研究計畫，於中期又獲得由奈特報業集團經營家族成立的奈特基金會 (John S. and James L. Knight Foundation) 經費挹注，得以透過講座、工作坊等形式，邀集在媒體、科技、新聞、和法律各領域中首屈一指的編輯、記者及學者共同加入，思考國家監控對新聞的實踐和角色有何影響，本書就是這個計畫的部分成果，這些作者為史諾登揭密的衝擊提供了詳盡的檢視。仔細一看每位作者都大有來頭，由此看來，說此書是討論史諾登事件與新聞業發展最權威的意見應不為過。

知易行難：監控社會中的消息來源保密

加密技術是史諾登給新聞媒體的當頭棒喝，一個後來常被提起的小故事是在 2012 年底起，衛報記者 Glenn Greenwald 就經常收到由匿名消息來源寄來的信件，要求他在電郵系統中採用「優良加密協定」(Pretty Good Privacy, PGP)，這是一套設定方式繁複的訊息加密應用程式。Greenwald 一開始不以為意忽略了這些訊息，對方鏗而不捨持續聯繫，提供安裝說明、最後甚至製作了教學影片，但 Greenwald 還是不為所動。後來這個匿名者——也就是史諾登，轉而聯繫影片製作者 Laura Poitras，Poitras 是 Greenwald 的同事，而且剛好對數位加密安全軟體頗有心得，透過她才得讓這條一直「接觸不良」的線接通，並迅速引爆這則威力十足的揭密案。

如果沒有 Poitras 牽線、如果 Greenwald 一直沒有採用加密軟體，這整個事件會是如何？Greenwald 錯過了在歷史留名的機會，與喬治波克獎、普立茲獎等新聞界最高榮譽擦身而過，世界上少了【第四公民】

(Citizenfour) 這部獲得 2014 年奧斯卡金像獎的紀錄片。但是這個聽來像是玩笑話的問題，其實指向了更深刻的答案：在這個監控技術發達的環境中，新聞工作者如果無視於加密技術的應用，不僅是少了接觸獨家重要新聞消息來源的機會，更是將消息來源的身份及安全置於危險之中。華爾街日報記者 Julia Angwin (2014) 曾以《天羅地網》(Dragnet Nation) 一書紀錄個人挑戰監控設施的徒勞：街角的監視器、隨身的手機、登入的網站無時無刻都在監控著我們；而掙脫的過程太辛苦、代價也太高。當然反監控有很多不同的作法，在本書中 Angwin 提醒我們，數位安全措施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在不同的「威脅模式」下，應該要視潛在的風險，而有不同的應變措施，她列舉了不同的背景狀況，列出包括隱藏、加密、偽裝、混淆視聽、變造資訊等實務上的教戰守策。就這個層面而言，本書對線上新聞從業人員、新聞科系教師、學生等「圈內人」提供了許多實務上的建議，值得一讀。

就實務面來看，新聞機構採取的資訊安全策略為何？多少記者曾經認真地去使用加密軟體、以保護自己及消息來源的資訊？老牌的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史諾登案之後的 2015 年，曾針對 671 位從事調查報導的新聞工作者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 IRE) 與他們對數位安全的理解做過調查，結果顯示有一半的受訪者沒有採用任何增強資訊安全的軟體，大約只有 9% 的受訪者會同時採用幾種混合的資訊保護機制。不到半數的受訪者有接受過相關保護自己及消息來源的訓練和說明。最常獲得這類訓練資源的管道是研討會或工作坊；而只有 15% 的人是在新聞機構或過去的工作單位中習得相關知識，僅有 4% 的受訪者提及曾在學校接受過相關訓練或討論 (Holcomb, Mitchell, & Purcell, 2015)。如果連從事調查報導的新聞工作者都只有這樣低的比例，不難想像眾多的新聞工作者會如何處理數位安全議題。這樣的討論

不出意外地很快就回到新聞教育上，哥倫比亞新聞學院院長 Steve Coll 就呼籲在目前的工作環境下，新聞科系應該整合數位安全和消息來源保護，納入課程訓練當中。

英雄或叛徒：新聞自由遇上國家安全

史諾登的揭密最常與 1971 年的五角大廈文件事件（Pentagon Papers）相提並論，當時前美國國安分析師 Daniel Ellsberg 將美國國防部編寫的越戰政策決過程等相關秘密文件交給紐約時報記者公開發表，當時越戰尚未結束，美國政府援引間諜法起訴 Ellsberg。半世紀之後的史諾登一樣被控間諜罪，關於他的歷史評價也游移在揭密英雄與叛國間諜之間，本書大部分的作者出身自新聞學術界及實務界，讀者應該不難想像其整體的英雄派觀點。以第一部分收錄的四篇文章為例，都是與此事件高度相關的當事人，像是前英國《衛報》總編輯 Alan Rusbridger 撰文討論史諾登事件讓新聞業思考記者如何透過報導伸張公共利益。《衛報》是最早取得資料的媒體之一，更在刊登第一波文件後受到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GCHQ）指控違反《官方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以禁制令及起訴相逼，迫使 Rusbridger 當著 GCHQ 技術人員面前，將保存史諾登文件資料的電腦加以毀損。紐約時報前總編輯 Jill Abramson，則為文細數從 911 事件後，該報在處理與國家安全相關議題時，所面臨到的困難抉擇。史諾登曾經提及：不將資料交給紐時的原因在於認為其過於屈從政府意志，這家美國招牌報業，雖然沒有在第一時間就加入戰局，不久之後也承接了衛報的資料持續發揮影響力。第三篇文章是由最早與史諾登見面、並率先發布報導的 Greenwald 演講稿改寫而成，他疾呼隱私權

是基本的人性需求。他也在史諾登事件後，創立了《攔截》新聞網（The Intercept），鼓勵記者挖掘史諾登文件、投入調查報導。這部分最後一篇文章，是史諾登與陶氏數位新聞中心執行長 Emily Bell 的視訊對談所編輯而成的，內容提及史諾登與記者及新聞組織合作互動的想法。就觀點而言，可能正如同編者在序論裡所說，由於大多數官方情報系統或公務單位人員都拒絕對此事發表意見，造成了本書在觀點上的不均衡。

第 11 章由曾任職美國司法部的 Steven Bradbury 所寫的「國家安全與『新黃色新聞』」，在立場上是唯一維護美國政府行為、抨擊新聞業的例外。文中 Bradbury 認為現在的新聞業為了賺取點擊率，專業主義已搖搖欲墜，而第一修正案又是記者的護身符，結果就是不實爆料或是過度誇張的新聞都成了明星記者用來追逐名聲的工具。他認為媒體對史諾登揭露的稜鏡計畫（PRISM）的報導過於誇張失真，而國家真正收集的資訊範圍比媒體所說的小得多，用所謂「全面監控」的說法是不正確的。與美國政府官方說法的口徑一致，Bradbury 告訴讀者，在大部分的情形下，NSA 並沒有竊聽電話通話內容；也沒有監視電子郵件的內容，NSA 收集的是所謂的「元資料」（metadata），指的是「描述資料的相關資料」（本書 23 頁）：你撥出了哪些電話號碼、時間、順序、受話者、上網的數據流量等等。元資料無關緊要嗎？當然不。假設你的伴侶固定負擔倒垃圾工作，元資料顯示每周裡會有幾天，他在出門前會撥出一通由異性接聽的電話，而在那幾天他都會繞遠路到下兩個路口去等垃圾車…，只靠這些元資料，我們的腦子裡應該已經可以上演無數小劇場了。在新聞業的傳統中，保護消息來源向來是記者的天職，直到 21 世紀，仍有如紐約時報記者因堅拒透露消息來源被控藐視法庭罪而入獄，而一旦元資料的蒐集成為常態，那麼就形同為國家機器開了後門，記者自身舉動都不能逃過國家監控，侈言保護消息來源。

網路作為戰場：開放數據、透明治理

這種將個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分割成無數資料，對此進行分析或治理的現象，都指向了更深刻的當代社會樣貌：伴隨著電子技術的變革和國內外政經情勢的更迭而興起的喬治歐威爾式的「監控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 Lyon, 1994, 2001），逐漸全面接管民眾的日常生活，並透過這些監控行為更進一步將民眾進行「社會分類」（social sorting），衍生出隱私權侵害及歧視等問題（Lyon, 2003）。與歐威爾《1984》筆下的社會和更早期 18 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 Bentham）提出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不同，我們現在面對的並非壓迫性的「老大哥」或者是讓人膽怯的看守技術，相反的，我們心甘情願拜倒在「谷歌大神」、「臉書大神」腳下，將我們心裡所想望、所欲求的事，無所保留地放進搜尋框中，我們打卡換取贈品、羨慕和按讚數，自願地成了這套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 Zuboff, 2015）系統中最辛勤的勞動者，而平台公司則靠著累積的資訊坐收巨額獲利。

從史諾登提供給衛報 170 多萬筆資料中，監控社會不再是概念上的討論，而已經是每日生活的實在。這個社會本質的變化與衝擊，是本書比較少論及的層面，反倒在大西洋彼岸開花結果，引發更多概念層次上的討論。以英國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為首而組成的研究團隊，進一步思考在我們身處的環境中，數位公民權（digital citizenship）和監控社會如何相互影響和折衝，這一套由國家—媒體—公民組成的三角關係，在史諾登揭密案之後，又當如何維繫？研究團隊採用了「資料正義」（data justice）的概念，指的是當我們處在以數據資料導向監控為核心的生活環境下，社會公平正義的概念是否隨之改變？哪些數據有

可能會對人民在社會和經濟的公平生活造成影響（Dencik, Hintz, & Cable, 2016; Hintz, Dencik, & Wahl-Jorgensen, 2017）？

換句話說，比起國家究竟蒐集儲存了哪些元資料，更重要的是，身為公民的我們，有沒有被告知、有沒有拒絕的選項、或是有沒有監督國家行為的權利？如果這些權利不復存在，那我們面臨的就是就不只是新聞業的挑戰，更是民主政治的警訊。首當其衝的是監控造成「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在史諾登揭密案後，包括全美最大的作家組織美國筆會（PEN America）調查顯示，作家有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閃躲爭議話題的傾向（PEN, 2013，轉引自 Wahl-Jorgensen, Bennett, & Cable, 2016）；2015 年學者 Marthews 與 Tucker 的分析也指出，民眾在線上討論政治敏感議題的意願降低；甚至維基百科上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條目和頁面瀏覽量都顯著下降了（Marthews & Tucker, 2015; Penney, 2016，轉引自 Dencik et al., 2016），可見國家的監控會壓抑公民意見的表達，不是一句「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就能夠釋懷的。最後，前述研究團隊的主持人、媒體學者 Dencik 與 Cable（2017）認為放任「監控實在論」（surveillance realism）的到來，全民都犬儒地接受了國家對人民的監控必然不透明、我們無處可逃而抵抗無望，只能坐以待斃的心態，才是民主政治最大的危機。他們疾呼民眾應當積極取回界定數位公民權內涵的權力、不放棄想像另類社會架構的可能。

史諾登揭密案後有多本相關書籍出版，以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剖析事件，其中較受矚目的包括 Greenwald 所著的《政府正在監控你：史諾登揭密》（*No Place to Hide*）重述他與史諾登見面採訪經過與觀察；另外衛報記者 Luke Harding 也出版了 *The Snowden Files*，娓娓道來史諾登如何在 911 事件後懷抱著愛國心決定從軍，希望能拯救被壓迫的人民，但

又因腿傷無法服役，其後輾轉運用個人資訊長才進入中央情報局工作，而後再轉至國家安全局服務的歷程。前述的卡地夫大學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也即將以《數據化社會中的數位公民權》之名付梓。不同出版品各擅勝場，對於理解思考史諾登揭密事件發端、或是對新聞業乃至於民主政治的影響，皆有可觀之處。

整體而言，史諾登揭密為新聞實務上矢志保護消息來源、平衡國家安全與公共利益的信念提出了警告，更甚者還挑戰了民主國家內涵的想像，因此吸引眾多新聞學者聯袂為文思考《史諾登之後的新聞業》的可能面貌：呼籲新聞工作者須增加對於軟硬體加密技術知識、更關心線上資料的數位足跡，並提醒民眾對國家和商業利益綿密的監控有更高的覺察與批判。史諾登吹響了號角，而本書的探問和論證則是助帆的風，將帶著新聞業整裝再出發。

參考書目

- Angwin, J. (2014). *Dragnet nation: A quest for privacy, security, and freedom in a world of relentless surveillance*. New York, NY: Times Books.
- Dencik, L., & Cable, J. (2017). The advent of surveillance realism: public opinion and activist responses to the Snowden lea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763-781.
- Dencik, L., Hintz, A., & Cable, J. (2016). Towards data justice? The ambiguity of anti-surveillance resistance in political activism. *Big Data & Society, 3*(2), 1-12.
- Hintz, A., Dencik, L., & Wahl-Jorgensen, K. (2017). Digital citizenship and surveillance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731-739.
- Holcomb, J., Mitchell, A., & Purcell, K. (2015).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and digital security.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ism.org/2015/02/05/investigative-journalists-and-digital-security/>.
- Lyon, D. (1994).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yon, D. (2001). *Surveillance society: Monitoring everyday life*. Buckingham, UK: Open

- University Press.
- Lyon, D. (Ed.) (2003). *Surveillance as social sorting: Privacy, risk, and digital discrimin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Marthews, A. & Tucker, C. (2015).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internet search behavior. Retrieved Decemeber 1, 2017, from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412564>
- PEN. (2013, November). *Chilling effects: NSA surveillance drives U.S. writers to self-censor*. Retrieved from the PEN American Center Web site https://pen.org/sites/default/files/2014-08-01_Full%20Report_Chilling%20Effects%20w%20Color%20cover-UPDATED.pdf
- Penney, J. (2016). Chilling effects: Online surveillance and wikipedia use.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31(1), 117-182.
- Wahl-Jorgensen, K., Bennett, L., & Cable, J. (2016). Surveillance normalization and critique. *Digital Journalism*, 5(3), 386-403.
- Zuboff, S. (2015).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echnology*, 30, 75-89.